

## The Social Attribute and Risk Management of Cyberspace in the New Media Era

Jiang Yining Wang Yanl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and mobile terminals, people have already involved into a new media era on the basis of digital technology. Structure logic for cyberspace is mainly constructed by individual nodes which are copied and extended from reality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 At every level from politics to economy to culture, cyberspace has showed phenomenons that blend and overlap realistic society. With a profound impact that cyberspace has on real space, its social attribute is increasingly clear: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 great boost to fully releasing the individual node's energy and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but risks in cyberspace also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cyberspace itself and the real society. We cannot overstate the importance of solving the urgent issue about risk management.

**Key words:** New Media Era; Cyber Space; Social Attribute; Risk Management

---

## 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社会属性及风险治理

姜怡宁 王艳玲

**摘 要:** 随着网络技术及移动终端的飞速发展,人们进入了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时

---

作者简介:姜怡宁,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艳玲,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高校“学科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人选,河北大学校外兼职博士生导师。

文章引用:姜怡宁,王艳玲: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社会属性及风险治理[J].中国新闻评论,2021,2(4):47-60.

<https://doi.org/10.35534/cnr.0204005>

代。网络空间的结构逻辑主要依靠个体节点复制、扩展现实中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都显示出了与现实社会交融与重叠的现象。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影响力愈加增强，社会属性也日益明晰。即技术赋权在充分释放个体节点活力、推动社会进步之时，网络空间的风险也会直接影响自身和现实社会的发展态势，风险治理也就愈加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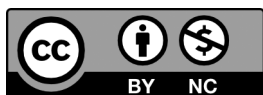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社会属性；风险治理

---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 (Thompson J.B) 认为，媒介重组了我们的时空，带来了媒介化的历史性、世界性和社会性。媒介技术调节了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人类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改变，其自身也逐渐浸润了人类的社会属性，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尤为明显。新媒体是一种以网络为主体的传播平台，通过数字技术、宽带局域网、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多种终端设备为用户提供不同需求的较为新型的传播媒介。新媒体的传播模式已经从曾经 web1.0 时代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大众门户”模式向今天的 web2.0 时代的“个人门户”模式迁移。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垄断被打破，部分让渡给了新兴媒介中由个人所掌握进而进行传播的媒体形式，受众成为传播的主角，网络空间中个体化节点的地位逐步提升。

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结构法则是以受众节点为逻辑的，加之网络新媒体平台本身所具有的社群化、自组织性、时效性、互动性、多元性、匿名性等诸多特征，虚拟的网络空间日益呈现出现实社会的诸多属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都与现实社会环境产生勾连。政治层面表现为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关系、阶层分化与资本分配；经济层面表现为数字背景下的“双轮驱动”；文化层面则表现为网络空间是文化混杂与创新的新场域。在这样一个个人门户数量即网络节点激增、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勾连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人类开展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场所早已不再局限于实体的物理空间，而是延展到以节点和核心为物质基础的计算机网络空间与地方、区域等社会空间虚实交织、二元共存的流动空间。作为人类活动新空间逻辑的重要依托，互联

网不再是可以借助匿名性而肆意妄为的法外之地。在网络空间社会属性的作用下,其影响不单是网络生态环境本身,也会对现实社会环境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构建力和影响力,网络空间的规范与治理业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 一、政治层面: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关系、阶层分化与资本分配

新媒体出现伊始,人们进入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在技术的赋权下,个体第一次拥有了可以在网络空间自由发声的机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去中心化、平民化、自主化的技术红利将构造一个平等的网络空间。事实却证明,曾经构想的、平等的网络世界只能沦为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网络空间仍然是一个“平机不平权”的关系结构,弥漫着较强的政治属性,仍然存在着现实空间中的权力关系、阶层分化与资本分配等特征。

### (一) 权力关系:话语权集中于少数个体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给权力下过一个定义,权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即权力作为一种影响力与支配力的度量尺度,也是网络社会有序运行的一种现实需求。一直以来,权力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机制:暴力/强制和话语/意义,暴力与话语机制互相成就,互为补充。在现代社会,权力由过去那样倚重暴力手段日趋变迁为依靠在人类头脑中建构意义而施行<sup>①</sup>。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建构意义系统的话语权往往只集中于少数群体,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中也同样如此。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似乎可以让人们摆脱现实世界中权力关系的制约,自由发声、自由表达、自由展示,成为完全平等的个体。实际上,这种平等依然是相对的,并不是每一个个体节点的发声与表达都会获得平等的关注度。网络空间并不能打破现实中的差序与约束,相反,有时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关系可能是现实社会权力关系的强化。网络中有限的注意力资源势必会倾向于拥有更多信息和话语资源的个体节点上,这种所谓的意见领袖在网络空间总是能产生比普通群体更大的影响力。

虽然网络个体节点的发声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网络空间中某些权力关系,但话语影响力的不同仍会导致新的权力关系被建立起来。这些新的权力关系也并非完全虚拟,它们的形成基础仍然与现实资源的获取与分配能力有关<sup>②</sup>。现实中掌握更多的资源如技术设备、使用能力、表达能力的个体往往能在网络空间中占据强势地位。加之,网络技术给权力赋权了相较以往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可见性,在这种网络空间权力关系的生成与发展逻辑的影响下,在现实中

①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0-12.

② 彭兰. 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12.

拥有更多资源即权力的节点之间还可以在网络空间中通过互动快速完成资源置换,诸如各大网络意见领袖之间的互动往往可以带动彼此的粉丝增长,通过资源置换,意见领袖个体节点的注意力资源及话语权力甚至可以达到指数级增长,从而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正如《完美的群体》作者兰·费雪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网络本身是一种自适应系统,它会遵循“幂律法则”,逐渐形成自己的中心节点<sup>①</sup>,这意味着网络空间中的权力往往会逐渐偏移集中于少数个体节点。

## (二) 阶层分化: 网络空间存在现实社会的阶层分化现象

社会阶层是由具有相同或类似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组成的相对持久的群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阶层分化作为人类社会化过程中“财富、自由和声望”等资源分流的必然结果,并没有对错之分<sup>②</sup>。网络空间中也存在阶层分化,其中的社会关系有时正是现实社会分层的映射,即网络社会中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着其在现实社会中阶级、地位和职业的烙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符号资源的阶层差异;不同阶层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阶层的人群信息关注偏好上的差异。

网络空间中节点的资讯符号占有和符号的象征意义差距,使不同节点之间形成阶层分化。符号(sign)包括信息(information)、标志/形象(symbols/images),信息属于认知(cognitive)内容,而象征和形象(symbols/images)属于美学范畴。<sup>③</sup>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的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0.4%,这意味着我国仍有近30%的人口并未接入网络空间。而在成功进入网络空间的70%人口中,其信息获取和使用能力由于政治、经济背景的不同和文化能力的差异存在分化,形成的数字鸿沟将网络空间中的用户进行了天然的分层;而在符号的象征意义层面,符号富裕者与符号稀缺者<sup>④</sup>在网络空间中所拥有的符号资本的价值不同,也就注定其在网络空间中处于不同的阶层。例如,自媒体人、知名美食博主李子柒在2016年因以“古法风格”形式发布原创美食视频而走红网络,在国内外俘获了大批粉丝,被誉为“东方美食生活家”。李子柒这个符号背后自然占有了“东方乡村生活”“诗意”“美食”“悠然”等象征,该博主自然成为了网络空间中的符号资本富裕者,在网络空间中处于较高的层级,而那些籍籍无名的个体节点只能因符号资本的贫乏处于网络空间的中下阶层。

加之,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城乡对立”“贫富对立”“性别对立”等现实社会中较为普遍的问题,在网络空间中依然存在且往往被放大,并通过网络热点事件使

① 兰·费雪. 完美的群体[M]. 邓逗逗,译. 杭州: 杭州人民出版社, 2013: 184.

② 张淑华. 网络阶层分化: 危机及“机会之窗”——格栅/群体分析的视角[J]. 新闻爱好者, 2018(10): 23-28.

③ Lash S, Urry J.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M]. London: Sage, 1994: 4+7+15.

④ 邱林川. 从信息中层到信息中坚[J]. 二十一世纪, 2006(97): 101-110.

得观点得以表达、释放。例如,在“乐清顺风车案”发生后,网络空间曾出现一种对社会底层妖魔化的声音,将罪犯的暴力行为归咎于其“底层”身份。当时网络空间中一度弥漫着一种中产向“底层”俯视的扭曲现象,在对底层的妖魔化渲染中,不同阶层之间甚至滋生了一种隔离仇视的情绪。“众声喧哗”的网络舆论场成为现实社会中不同阶层群体冲突的映射。

此外,不同阶层的人群在信息的选择和阅读偏好上有着很大的差异。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城市—农村”“超大城市—中小城市”<sup>①</sup>这样的社会空间分化,网络空间也顺应了这样的阶层分化。从“今日头条”网民阅读的热门文章可知,超一线城市用户对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更感兴趣,对官员贪腐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一线到四线城市用户关注内容相似,多为公共利益、个人权利、民族情感、官员贪腐等话题;五线城市用户除了上述话题外,普遍更加关注黑社会相关话题。<sup>②</sup>即人们信息的关注偏好带有一定的“阶层烙印”,不同阶层人群在“信息觅食”过程中的选择性关注可能会进一步拉大阶层间的信息不对等,在信息茧房、群体极化作用下产生的极端化的情绪和观点将影响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话协商。网络空间极有可能因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观点分化而出现网络巴尔干化,使网络空间的撕裂难以统合。

### (三) 社会资本: 网络空间资本积累遵循现实社会法则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Bourdieu, P)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社会资源的集合体,它们或多或少与制度化了的相互认识与认知的持续关系网络联系在一起……通过集体拥有的资本的支持提供给它的每一位成员。”这说明社会资本是一种与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的资源,以相互认知为基础。布尔迪厄还曾有言,“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sup>③</sup>即社会资本的获取来源于关系网络,而资本量的大小则与关系网络的规模成正相关。

在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个体化节点地位提升,许多应用也随之发生了结构改变,拆解了明确的区隔边界,人们只需要通过以某种方式形成的关系链条进行链接,诸如标签、好友推荐等纽带编织出复杂的关系网,形成一种以个体为中心、动态可变、边界可以随个体节点喜好而扩展或缩小的空间关系。在这样的开放、链式的社交空间中,关系被分解到了一对一的链条上<sup>④</sup>,社会资本的获取需要个体节点与特定对象用特定方式如帖文互动、讨论等发展关系,更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情感成本维系关系,这与现实社会空间中社会资本的获取方式相同。在资本获取量方面,根据布尔迪厄的看法,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它能有效动员的关系

① 李强,王昊.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9): 14.

② 彭兰. 新媒体用户研究: 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128.

③ 周红云. 社会资本: 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的比较[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4): 8.

④ 彭兰. 新媒体用户研究: 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网络的规模,个人在社会“互动领域”(fields of interaction)<sup>①</sup>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不均等分配,在限制个人的同时也可以赋予高占有者以能动性,即占有丰富社会资本的个体可以通过资本的再生产而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一点在网络空间仍然存在,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社会由个体节点连接构成,但个体连接的节点数量却不相同。在网络幂律法则的影响下,如果某一个体节点的连接多于其他节点,且由于其占有的话语资源、社会资本等优势,这一节点的连接渠道将会滚雪球般呈现出指数级增长,该节点的社会资本获取渠道及存量自然也会多于其他个体节点,与现实空间中社会资本积累一样具有马太效应。

## 二、经济层面:数字背景下的“双轮驱动”

在网络空间中,新媒体的“元资本”能力被进一步释放,具有了通过改变个体节点认识、习惯,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的能力,成为一种虚拟生产力,使网络空间被打上经济属性的烙印。

### (一) 产业数字化:传统经济的迭代转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在布尔迪厄有关“符号权力”和国家权力“元资本”启发下,指出媒体具有影响社会空间各场域的“元资本”能力,并提出了“媒体元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媒体可以通过合法化、再现和归类机制,影响个体行动者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包括影响个体在社会行动中的习惯,从而成为可在各场域内流通的“新型基础资本”。<sup>②</sup>新媒体“元资本”被转化为经济资本的突出表现为数字背景下的“双轮驱动”,即产业数字化带来的传统经济的迭代转型与“新基建”背景下的新经济模式升级。在2015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可以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给传统行业带来了深刻的颠覆和变革,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原来传统行业的边界被迅速打破,消费、教育、文娱、汽车、新技术、企业服务、医疗、金融、房产、出海等涉足各个领域赛道的传统企业都纷纷向互联网布局、转型。“互联网+”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传统商业活动的各环节都可以实现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买卖双方可以在不谋面的情况下进行各种交易、商贸、金融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

随着互联网底层逻辑带来的全球化流动空间的形成,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了跻身世界市场的能力。新媒体的繁荣无疑更加直接地赋予了电子商务全球化更强大而坚韧的生命力,为商家

<sup>①</sup>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sup>②</sup>周葆华. 新媒体使用与主观阶层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J]. 新闻大学, 2010(2): 12.

提供了一种新型且高收益的营销方式——新媒体营销。这种方式以新媒体社交平台为载体，通过电子商务运营模式，深刻揣摩消费者心理和消费习惯，将目标客户的画像精准化，传播落点直击广大的目标用户。新媒体营销也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营销流程，将丰富的网络用户节点资源变为具有潜力的营销资源，打造出全新的营销链，充分激活了潜在的目标消费群体及其消费潜力。除了文字、图片、声音结合的传统营销方式，以短视频、直播等为主的新的营销样态出现，品牌纷纷将战略布局转移到了小红书、抖音、快手等新媒体社交平台，争夺新媒体营销的红海市场。根据 CNNIC 的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已达 1.69 万亿元，为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的助力支撑。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央视新闻甚至直接把直播间搬到黄浦江边，在 2020 年 11 月 6 日联合中意客户端，由康辉和网络主播李佳琦带来意大利专场的带货直播；11 月 7 日联合总台欧拉中心，由朱广权和带货主播薇娅带来俄罗斯、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专场带货直播，共创造销售额超 1.4 亿元。迄今为止，央视新闻新媒体已举办 22 场带货直播，总销售额超 50 亿元。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 CNNIC 的报告中得出，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得到了深入推进：2019 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达 36.0%，其中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达 23.8%；全国应用“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管理体系标准企业数量突破 2.8 万家，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 71.5%，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51.1%，从中不难看出互联网空间所能释放出的强大经济效力。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给传统产业创新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仅可以通过挖掘新媒体网络空间中的用户节点激活潜在目标消费群体，扩大市场范围，充分焕活了传统经济活力，将新媒体“元资本”充分转化为“经济资本”，还能促使传统企业更新升级，从内部完成数字化迭代转型，进一步提升经济效益，网络空间中的经济属性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 （二）“新基建”背景下的新经济智慧范式升级

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社会属性的经济层面不只体现在实体经济产业创新，还表现在新互联网生态中新思维催生的新经济样态。在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个体的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充分强化，一种以为个体化节点提供优质服务，力图从中获得可能资源的新思维逻辑诞生。即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大数据采集为基础的数据经济；基于对场景的感知提供适配服务的场景经济，以连接并合理匹配需求和资源为主导的共享经济和以集聚用户生产力为主导的社群经济。这几种新的经济形态均凸显了新媒体时代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附加值，这种经济附加值在“新基建”的大背景下将得到进一步的升级。

2018 年 4 月，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信息基础设施”和“网络基础设施”进行了强调。2018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首次提出了“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正式开展包括 5G 网络、区块链、云平台、

物联网、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的新技术的发展布局。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已建成5G基站71.8万个,连接终端超过1.8亿个,已建成全球最大的5G网络;在区块链领域,全国已建成40个区块链产业园区,区块链相关企业数达64996家,2020年上半年区块链产业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46.5%;在人工智能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在各行业深度融合和落地应用。“新基建”的显著成果必将进一步带来新经济形态的加速跃升,推动新兴技术向社会、经济领域渗透,创造出新的应用场景,发展出诸如“智慧农业”“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交通”等一系列“智能+应用场景”的新概念,促进经济向“智慧范式”升级,这种智慧范式将为我国带来引领产业发展的机会,帮助我国实现经济赶超,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创新,甚至加速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sup>①</sup>

“新基建”发展的关键是新技术的集簇,以5G为关键驱动将其余各类新技术高效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使它们进一步发挥出智能化作用。各类新技术在联动中起到一种发酵粉的催化作用,赋能新经济发展实现“指数效应”增长。这里以共享经济为例,它是一种利用移动互联网平台,将闲置或未充分使用的时间、空间、物体等资源,就近向有需求的用户提供及时服务的一种新经济模式,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新基建背景下,典型技术如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都将进一步使共享经济领域发生变革性的改变。诸如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可以使企业同样达成共识性的去中心化架构,帮助企业不再投入巨额资金维护自由服务器群,节点式存储的数据也可以帮助企业削减经营成本;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深度提取用户特征等关键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服务;高速率、低延时的5G技术则可以快速处理信息,对不同层级的需求进行归类处理,完成资源调配。在新技术的支持和推动下,共享经济将进一步呈现出共享模式分化、泛化共享和定制化、创新化共享发展。<sup>②</sup>

简言之,这些具有高度创新性、渗透的新技术不只带来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经济模式的改变,更进一步颠覆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虽然新基建对网络空间的新经济形态的具体影响方式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时代的发展和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来临,我们可以也应当大胆想象新基建会给网络空间的新经济形态带来的巨大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新基建布局带来的新技术发展将联动促进新经济形态的进一步智慧式升级,形成1+1>2的合力,实现新经济形态潜力量子跃迁式的释放,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崭新的活力。

① 赵剑波,杨丹辉.加速推动数字经济创新与规范发展[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9.

② 宋立丰,鹿颖,宋远方.科技创新下的共享经济变革研究——以我国“新基建”与共享出行为例[J].当代经济管理,2020(43).



### 三、思想文化层面：混杂与创新的新场域

新媒体时代节点化的网络空间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意见表达和沟通交流场所，凭借互联网对地域限制的消解，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用户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传达自己的见解。网络空间成为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多元文化碰撞与社会思潮交锋的场所，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想混杂的局面。网络空间不只是全球范围内多种思想思潮的角斗场，也是孕育滋养创新文化的新场所。

#### （一）多元混杂的社会思潮的交锋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中，大众通过自传播等个人信息活动，通过各自的微观信息处理活动，不仅构建了自己的网络，同时也形成了属于自身的自文化<sup>①</sup>。新媒体技术自身的诸多特性使网络空间成为培育和发展与时俱进的创新文化的新土壤，也给予了社会主流文化之外的诸多亚文化以最大的生存发展空间。而新媒体技术的即时性特征使得时间被湮灭，空间被时间征服，<sup>②</sup>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汇聚导致各类混杂的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中弥散发展乃至放大矛盾。

在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我们时常可以通过各种国内外社会热点事件看到多元思潮的交锋。例如将美式自由民主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思潮，在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当拜登以多数票击败推特治国的前任总统特朗普赢得选举后，国内网络空间中便出现了一种鼓吹美式政治所谓的自清纠错机能的声音，全然不顾美国政府抗疫不力、让人民的生命安全遭受的严重损失，本身就是美式民主对人权最大的亵渎。再如，以制造种族、国家间的冲突对立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潮，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席卷全球，在疫情期间欧美等国政客为了掩饰自己抗疫不利，利用“功夫病毒”“熊猫瘟疫”等标签污名化中国来转嫁国内矛盾，这些匪夷所思的污名化恶意标签甚至借助于政客的助推在社交网络平台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偏见和民族主义情绪在西方世界中死灰复燃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sup>③</sup>。

中西双方本就处于各自迥异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框架下，再加之被煽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网络空间成为中西方世界开展“对冲式”话语和“睚眦必报”的价值观交锋的场所。2021年，以BBC、CNN为主要幕后推手的西方媒体炮制了大量关于我国“新疆棉花”的假新闻，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这些具有政治意图的假新闻通过媒体的助推在西方大量传播，而揭露真相的声音又被西方媒体压制，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也为虎作伥，利用限流、删帖等手段

①Beck U, Beck-Gernsheim E. Individu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M]. London: Sage, 2002: 42.

②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③史安斌，董桐. 世界主义视域下的平台化思维：后疫情时代外宣媒体的纾困与升维[J]. 对外传播，2020，288（9）：3+6-9.

压制真相的传播。在中美竞争关系紧张升级的大背景下，西方政客炮制出的这种以虚假的“新疆牌”为手段的对华政策无疑在世界各国民众中进一步散播了仇华情绪，以不知情民众的同情心作为筹码和政治工具，将中西方进一步拉进互相仇视的漩涡，现在，有62%的加拿大人支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美国人坚信他们需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数据来源：“新疆真相追击——加拿大研讨会”线上会议视频）

加之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消融了现实中的阶层隔阂，狂热的消费生活图景被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侵蚀网络空间的资本通过营销运作，逐渐使消费与社会地位、生活品质等理念挂钩，网络空间已成为氤氲消费文化的温床，生存于数字化时代的用户自然会深受消费主义的影响，诸如国内的女生节、女王节、光棍节、国外感恩节后的黑色星期五等，就已成为被消费主义渗透和绑架的工具，商家用“消费自由”的话语解构了节日本身的意义及节日背后本应该追溯和更值得探究的逻辑，将消费者桎梏于消费主义的窠臼中，在网络空间中弥漫起一股消费主义思潮。

## （二）自文化的生产与创造

新媒体为大众的自传播创造了技术条件。大众自传播即由受众发起、进行的传播，虽然没有大众传播机构的资源，但依靠网络等新媒体技术依然可将信息达至全球广大受众<sup>①</sup>即用户可以通过大众自传播将个人信息活动进行处理与传播，构建属于自身的“自文化”。这种自文化是一种集生产与消费为一体的创作形式，是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中内容产业创新与改变的源泉<sup>②</sup>“自文化”主要可以分为知识的协同生产和网络亚文化的发展，知识的协同生产是一种基于同一目标的多人参与的，通过协商交流等社交活动来达成目标的可迭代重复的知识生产过程。<sup>③</sup>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知识的作者。知识的协同生产的典型案例便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是一种由众多网民一同建构网络词典，增益人类知识的生产社区，需要通过多人参与，协商交流的方式来创造和生产知识，它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由权威和精英掌握的知识定义和诠释模式，赋予了普通网民以知识自主生产、知识定义及阐释权。这无疑大大丰富和繁荣了文化的生产创造主体与形式，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活力。

网络亚文化是自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亚文化又称集体文化或副文化，是与主文化相对应的那些非主流的、局部的文化现象，亚文化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价值与观念。新媒体具有大众自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众面广的特点，网络社群也天然具备可以形成趣缘组织的特性，

① 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Hess T.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by Axel Bruns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2009, 11 (3-4): 155-156.

③ 张博，乔欢，张新智. 协同知识生产社区内容质量评估研究综述——基于维基百科 [J]. 情报杂志, 2015 (2): 180-187.

这些特征都给亚文化在网络空间中孕育与发展提供了优渥的条件与保障,各类亚文化在我国网络空间中悄然崛起。近年来在网络空间中流行的几种文学创作形式,如“耽美小说”“同人文”等都属于亚文化的代表,这些网络文学通过网络平台传播、销售,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的内容表达边界、创作形式和传播方式,构建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表达风格,呈现出鲜明的非主流文化特征,并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半封闭的写作、阅读和消费圈层。

此外,网络恶搞文化则是创作主体利用新技术在赛博世界构建的与主流社会相区隔的文化空间,建构和展示了创作者的亚文化身份、独特的文化诉求与生活方式。创作者一般会在网络空间中生产自己的文化符号,解构和反叛主流权威,消解、颠覆主流文化,企图用一种戏谑的方式表达对主流文化的对抗和不满,夺回自己的话语权。这种网络亚文化群体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和舆论影响力,它们蕴含着的这种价值张力甚至具有改变政治结构的潜力。<sup>①</sup>像曾经在网络空间中盛行过的“自嘲文化”就表达了一种对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不满却又无能为力的反向运动,以恶搞的形式进行的“微博监督反腐”则加强了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防、警示和惩戒的作用。

## 四、新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风险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均体现出了与现实社会相勾连的社会属性。这预示着网络空间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力显然并非全是积极正面的,也会带来诸如政治层面的网络空间话语权力再集中、阶层分化、资本分配不均,引发现实社会阶层的撕裂;经济层面出现金融风险,交易失信、不正当竞争等诸多负面影响;文化层面出现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越轨偏移、主流思想难以统合等一系列问题。那么,如何规避上述风险,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对网络发展生态及现实社会治理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一) 积极构建公共空间、推动弱势群体对话协商

网络空间政治属性层面出现的权力关系再集中、阶层分化、资本积累差距大等问题可能出现鲍曼所言的“不存在之地”。<sup>②</sup>对于掌握权力资源、社会地位高的人来说,处于较低社会阶层,权力资源匮乏的人无法进入其精神版图,阶层之间出现断裂。在网络空间中由较强同质性的用户组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可能因社会地位、立场、爱好等的不同而与其对立面形成强迫性不信任,却在彼此间产生无原则的信任,出现“信任异化”,信任逐渐转变为制造隔阂、形成对

① 喻国明. 网络舆情治理的基本逻辑与规制机制[J]. 探索与争鸣, 2016(10): 9-12.

② Bauman Z. Liquid modernity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102-104.

立认同甚至网络暴力的资本。<sup>①</sup>如果不加以规制和引导,很有可能在现实社会中进一步放大,加剧社会的不公平现象。为了弥合网络空间中的这种断裂,推动不同层级人群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成多元主体间共识的达成与相互之间的体谅、给予网络空间中的话语弱势群体以扶持,使话语资源适度向弱势群体倾斜就显得尤为必要。推动不同利益层级、不同社会属性的群体间的交流与对话成为达成共识、弥合撕裂的重要手段。即应该鼓励各级政府、学术团体、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不同属性媒介构成的开放式网络空间中就共同关心的公共议题进行信息发布与沟通讨论,主动重构一个新的超越阶层属性的公共对话空间,呼吁民众理性关注关乎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社会热点事件,而非在肤浅的娱乐新闻中麻痹自己。为保证公共对话空间的有序运行,应适当恢复公共权力,对过度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趋势做出修正,积极寻找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平衡点,防止私域对公域的过度侵蚀。

此外,我们应该积极利用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构建弱势群体的对话协商机制。由于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力集中,弱势群体本身难以获得较多话语资源与关注度,诸多诉求势必难以进入讨论空间。且弱势群体通常社会地位较低、技术使用能力也不强,往往呈现出分散化的“单打独斗”。如果具有公益性与自愿性,且有较多话语权与社会资本的社会组织,可以整合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帮助其通过合理的渠道和方式进行传播,便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话语资源倾斜的问题。例如,由记者王克勤、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联合发起,腾讯网、搜狐网、新浪网、支付宝公益、天涯虚拟社区公益核心支持的慈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旨在寻找与救助尘肺病农民患者,一直以来致力于为在劳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却由于经济困难得不到及时救治的农民工尘肺病人呐喊呼吁,将尘肺病弱势群体堪忧的生存图景和愿望诉求在网络空间中展示出来,引发了网友的注意,进而提高这一群体的受关注度,不只帮助他们得到了治疗,也让他们得到了生活救助、子女助学等进一步的改善。

## (二) 数字人民币与区块链重构数字经济生态

依托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经济商业本质上是一种数据和流量入口的竞争,这就给各类企业和平台留下了极大的暗箱操作空间。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多以数字支付渠道为核心,具备高经济价值的商业场景进入互联网商业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大型科技公司依托其具有的庞大用户基数和相对成熟的大数据运营体系,实现了数据分析(Data Analytics)、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和紧密结合的(经济)活动(Interwove Activities)三个环流的联动,打通了从数据生产到价值变现的完整数字产业链,从而形成了一个闭环的“DNA”生态。这极易引起部分大型科技公司通过“数据垄断”优势进行混业经营,甚至采用不正当手段损害公平竞

<sup>①</sup> 彭兰. 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争,获取超额利益,造成“赢者通吃”的局面。例如中国前30大App中有七成隶属腾讯、阿里,意味着10亿中国网民在移动生活中产生的数据被这些头部数字科技巨头瓜分。<sup>①</sup>即在依托数字发展起来的各类新经济蓬勃发展之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诸如数据垄断、政府监管薄弱、用户隐私泄露、侵犯知识产权、信任危机、平台的管理黑箱、假货泛滥等一系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应用数字人民币和区块链技术来重构数字经济生态。

数字货币是一种由中央银行发行,以国家主权为信用来源的,以电子形式存在的法定货币或交易媒介,具有分布式记账和去中心化支付体系特征。在世界各国纷纷布局数字货币的大背景下,我国也紧跟大势,完成了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截至2021年5月,数字人民币已在深圳、苏州、长沙等多地进行了公开测试。使用数字人民币相当于现金交易,中间省去了平台和银行,没有手续费,可以达到匿名付款的作用,保护用户隐私。我国数字人民币顺应了“无现金”时代的发展,不但可以提升支付体系的安全性、国内及跨境支付的效率,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普惠性,还可以在打击金融犯罪方面发挥出优越性。<sup>②</sup>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数字人民币得到普及后,网络经济的治理水平也将得到进一步跃升。

与此同时,区块链技术也可以助力网络经济的重塑及监管。区块链由一个共享、容错的分布式数据库和多节点网络组成,数据仅可通过共识算法以块的形式增加,不可修改或删除,能够有效避免数据被篡改,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不依赖受信第三方的数据记录和链上数据溯源。区块链可以为商品加上一个电子身份标签,完整记录原材料的来源、生产过程、出厂检验、交易物流等各个环节的信息,为工商部门执法监督提供证据。诸如美国加州硅谷的区块链创业公司提出的Skuchain已被应用于新西兰龙虾和高档红酒进口中国的商品保真上。区块链还可以通过记录数字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价值转移等全过程的电子信息让消费者识别数字产品的真实性,美国Blockai公司就已经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其数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区块链的抗篡改和可追溯性可以让其应用于建立匿名信誉系统,有效保证电商营销和评价的真实性。即将区块链的底层技术逻辑运用于电子商务中可以有效解决网络售假、数字产权保护、虚假营销、黑箱竞争等一系列问题,帮助我们建立效率和信任的交换,有效实现竞争执法和反垄断监管,大大提高网络空间中数字经济的监管效力。

除此之外,加强信用记录、风险预警、违法失信行为的在线披露和共享,为各类数字经济参与者提供信用信息查询、企业网上身份认证等服务<sup>③</sup>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明确规约的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均专门明确了

① 刘典. 数字人民币:数字经济的生态重构与全球竞争[J]. 文化纵横, 2021(1): 40-48.

② 刘凯, 郭明旭.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动机、设计方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国际经济评论, 2021(3): 152.

③ 马化腾. 分享经济将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能[EB/OL]. (2016-03-03). <https://tech.qq.com/a/20160303/045376.htm>.

对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各项权益的保护。随着各类新经济模式的升级,我们也必将面临更为复杂多样的法律主体、法律客体及法律关系,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完善数据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借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杨东的说法,针对滥用相对优势地位、利用数据集中后形成的数据流量优势损害其他小型创新性平台利益、平台为扩大自身产业生态圈进行流量垄断等问题,均应纳入《反垄断法》,重构相关市场界定的分析框架,为《反垄断法》在新经济、新业态的适用中提供更为充分的价值基础。<sup>①</sup>

### (三) 重视网络文化价值引领、引入技术纠偏机制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打破了封闭、稳定的社会结构,将整个世界都笼罩在一张网络里,其技术赋权给予了网络中个体节点生产与创作的机会,多元价值观导致的各类社会思潮和形态丰富的自文化共同构成了网络空间中的文化属性,但文化创造活力被激活的同时,纷繁的思潮争鸣、多变的文化类型也在冲击着人们原有的认同模式和心理格局,破坏了文化的整体性,甚至引发人们对自身主流文化的认同危机。即在网络舆情事件中,非主流价值形态往往会迅速挤占舆论场,稀释主流价值观的生长空间和传播力度。对此,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渠道多样、井然有序的意识形态平台,在舆情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抢占舆论高地、牢牢把握舆论的主动权,创新引导的方式,尊重并适应网民的深层次心理结构,对其进行潜移默化的启发,提升网络空间中的意识形态引导力。我们还应该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整合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共生性,找到其价值交融之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多元文化区间的“交集”,进而促进网络空间健康、文明、有序地发展。

另外,我们还应该在网络空间中引入技术纠偏机制。互联网的匿名性容易使网络用户出现语言偏激、相互谩骂、人身攻击等非理性的行为。这种带有极强偏激色彩的语言攻击,只能使各阶层群体之间产生更严重的撕裂与分化,网络空间变得更加乌烟瘴气,这就需要在各大交流平台引入技术性纠偏机制,对用户的不文明用语采取适当的提示、禁言惩戒。技术纠偏机制的开发与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肃清网络空间的不文明行为。

综上所述,新媒体时代的网络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均体现着与现实社会相勾连的社会属性,相应地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风险。为了规避上述的各种风险、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我们应该采用重构公共空间、推动构建弱势群体对话协商机制,帮助弱势群体合理表达诉求;重新构建适用于新经济思维的信任体系、基本法律法规与竞争规制体系;重视网络文化的价值引领、引入技术纠偏机制,促进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和谐有序,进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促进全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sup>①</sup> 杨东. 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理论和规制体系的重构——以竞争法为核心[J]. 学术前沿, 2020(17): 10.